

第二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与个体化

杨 君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 要]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第一现代性中,个体生活在确定性的社会模式之中,由于风险社会的延伸,个体超越了第一现代性中具有确定阶级和社会地位的线性社会。在市场系统、福利国家、培训系统等制度作用下,个体获得了第二现代性下的“为自己而活”的不确定性自由,并且经历了一个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然而,过度的个性化正在危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根基。因此,涂尔干笔下的社会学命题对于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命运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风险社会;个体化;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3)01-0131-06

社会是贴近我们生活的日常现实,但是,我们并不因为生活在其间而有更多的了解,就像我们并不因为自己必然作为有生命的身体存在而对生理学有更多的了解一样。那些我们不知道其存在的、处于遥远的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它们的生活方式引发我们思考自己生活的本质。社会中各种看不见的规则与机制组成的系统,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并操纵我们的思想,它似乎像自然风景一样是永恒的,但事实上却像孩子的手势一样变化不定。

如今,社会正在发生一个转变,即人的发展空间得以自由拓展,操控自己生活的力量得到加强,但同时,人们却对于职业的稳定、福利的保障、四伏的危机、泛滥的毒品、共同体的丧失、家庭的解体、道德的沦丧和对个人利益的无止境追逐等状况也感到普遍的担忧。

现今,我们处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个人主义时代。贝克在《个体化》一书中认为,过度的个性化正在危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根基”,却“变成了从属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的进程

或发展正在悄悄地侵蚀着现存社会结构、制度和实践,从而导致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又将为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推波助澜。

一、确定性原则: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化论述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学家日后称之为“社会”的范畴,只是停留在基督教王国这一单一共同体中。这是一种神圣的、道德的秩序,它借助各种仪式,将个体融入教会的圣事机制,以此展开运作。

当中世纪这种神意秩序衰落后,社会学中的“社会”观念才取代了基督教王国,开始着力塑造和表现人类的社会能力^[1]。这一时期人类关于社会的种种描述,仿佛是一股——从传统到现代性、自信仰到理性、由再生产到生产,以及如滕尼斯(F. Tonnies)所说“由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的——潮流在无限翻涌^[2]。这一切都明确地把社会与现代性画上等号。

[收稿日期]2012-08-18

[作者简介]杨君,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在第一现代性^①下 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明确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成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也就是说,第一现代性,即结构现代性中,社会被视为线性系统。在社会学家中,涂尔干和帕森斯的社会体就是这样的线性系统。涂尔干坚持了某种整体性的线性社会观。在涂尔干的眼中,社会既被看成一种实体、一种事实,也被当成神圣的范畴,任何人都需要进入其社会范畴中,而个体仅仅是社会中的附属品。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帕森斯认识到了行动与社会秩序的脆弱性,看到了分化和进步的同—性,同时相信现代社会规范秩序的能力。他通过社会化理论和以一种或多或少和谐的方式来团结社会。因此,帕森斯的线性社会观强调了个体在社会平衡中的计划作用,同时,假设了各种不同系统的存在,而其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受到独立结构化机制支配,仅仅随着或多或少偶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运动互相渗透。在帕森斯的笔下,个体的命运仅仅是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无论是涂尔干眼中的“道德个人主义”^②,还是帕森斯笔下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③，“社会结构论”始终处于社会整合的支配地位,个体始终受到来自外部的束缚和压力,个体没有自主性与能动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哈贝马斯对涂尔干、帕森斯的线性理论和帕森斯式社会学在战后数十年的支配地位不满。二者都强调了行动而非结构的重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理论史只不过是一种行动理论和一种系统理论模型的分裂历史,因而不可能把这两个范畴置于一个能把系统和经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概念中^[3]。因此,他希望完成这两个范畴的综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是殖民化的,系统以及系统理性化的特质已经比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独特形式更具有优势。其解决之道在于生活世界以及系统必须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理性化。系统和它的结构必须能被允许变得更具有差异性、复杂性,但生活世界必须再精炼以便让自由沟通变得可能,让论辩主张能够胜出^[4] (pp. 304 - 305)。

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和系统

这两者的完全理性化能促使它们以相互成长、而非以相互压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行动者中的个体能够通过交流、沟通来实现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的融合。在哈贝马斯的描述下,个体通过沟通行动来建构线性的社会系统。可以公平地说,哈贝马斯行动线性的另一面变现为涂尔干、帕森斯的系统线性。

在《个体化》一书中,贝克依然坚持了“制度化的个人主义^④立场”。一方面,从社会制度层面讲,贝克批评了哈贝马斯的行动线性论,他认为如今社会正处在分离和风险之中,个体不可能建立一个完

① 现代性的关注,是晚近西方的现代性论争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卡利奈斯库在其《现代性面观》一书中提出,现代性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存在着无法改变的分裂:第一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与社会急速变化的产物;他把第二现代性称之为“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它反对前一种现代性,因此,规定文化现代性的就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就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也提出,现代性实际在西方历史上体现为两种规划,一种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一起成长的文化规划;另一种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也指出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主义,但他同时强调,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反观自身并力图获得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即呈现出现代性的不可能性,而正是这一点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鲍曼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在于,他道出了现代性的不可能性。现代性的自反性运动是风险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然而,在贝克的眼中,第一现代性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在这一形态中,现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制度性与规范性的整合。在第一现代性(工业社会)中,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在进步乐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否认一切风险”。

② 依据涂尔干的观点,我们一方面由感觉和感觉趋向所组成,另一方面由概念化的思想和道德组成。我们的感觉趋向是利己的,它们不来源于社会,甚至与社会相对。在涂尔干看来,人性中属于社会性的那一部分,是集体欢腾的情感强度孕育并滋养的。比如说,人们的行动之所以遵从道德义务,并不是因为理性的原因或纯功利计算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些道德义务的神圣性。事实上,观念和情感构成了社会成员的遗产,但他们是“非个人性”(impersonal)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经社会演化而形成的,并非任何特定个人的产物或特性。也就是说,在我们心中存在着某种“非个人”的因素,因为某种社会因素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社会生活既包括表现,也包括实践,那么这种“非个人性”就自然而然地扩展到了观念和行为上面。

③ 是指线性的自我再生产系统,意味着“结构性的个体化”是一个线性的、封闭式的过程。

④ 牛津字典中对个人主义的定义是:(1) 独立和自主的态度或立场;(2) 尊重自由的个人行动的一种社会理论;(3) 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或行为,即自我主义。因此,个人主义的定义,更多地倾向于独立和自主的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或行为的释义。

全安全、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贝克批评了涂尔干的道德—伦理个人主义、帕森斯的制度化个人主义,而提出了一种由“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选择性人生。这里的个人主义既不是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伦理—道德的个人主义。

正是因为如此,贝克认为,在第一现代性中,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意识与阶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都有明确的分离和界限,社会学家把个体化仅仅理解为主观的现实,即那种需要把它与客观阶级分析对立起来并接受阶级分析的主观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讲,在第一现代性中,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社会范畴得到了强化。或者说,个体化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示和角色模式的强化。只要这些范畴呈现出来,个体的命运就会被限制在以往那些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之中。在他们看来,维持线性模型的是单个的平衡点,只有外部力量才能打破这种平衡,导致系统变迁。

二、风险社会:个体化与“不确定的自由”

贝克认为,当进入第二现代性之后,社会不再是一个具有明确界限和分割的实体,而是一种非线性、开放的模糊状态。关于第二现代性的论述,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包括两个阶段,即工业社会和不可控制的风险社会。在工业社会,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在进步乐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否认一切风险”。在第二阶段,“风险意识已被普遍接受,因此进步意识原则上已被打破”,风险为我们每个人所感知,而且越来越不可控制。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是与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大致指涉为同一历史阶段,即不可控制的风险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4] (P. 367)}。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批判,通过扬弃线性的、简单的“第一现代性”(或“现代工业社会”),而发展出自我批判的“第二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5] ①}。这样,第二现代性的表征即是风险社会。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6]。风险已经成为我

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不仅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我们被风险环境包围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个体也许希望自己具有反思性,但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反思。他是个游荡者。他联络网络,建立联盟,达成协议。他必须生活在、也被迫生活在风险环境之中,在这环境中,知识与生活都是不确定的。

不难判断,在贝克的论述中,确定性已经分裂成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今正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而风险社会的加剧,导致了人的非理性,导致开裂伤口的反复擦伤,以及相互攻防。生活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对生活起支撑和引导作用的社会“本能替代物”被卷入到需要考虑和抉择的研磨机中。如果说,常规和制度有一种减负功能,使个体性和抉择变得可能,那么常规的解体,会导致何种障碍、引发何种努力、造成何种压力,也就变得清楚了。当种种限制变得可参透并最终被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帝的东西或者自然事先给定的东西,如今转变成了种种问题和抉择,尤其体现在私人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根据文化史的观点,从主体要求自主赋权开始的现代性,正在履行自己的诺言。现代性扎根后,上帝、自然和社会系统正在以或急或缓的步伐被困惑、彷徨、无助、茫然的个体逐步取代。

随着旧有格局的消失,个体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一方面,个体面对“分裂的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这些自由是不确定性的,充满无限的风险;另一方面,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势的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只要这些解体趋势呈现出来,就会面临新的问题,社会是否会呈现新的生活模式呢?

① 现时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社会就是我们的时代境遇。它不仅重新审视现代性路向,而且实际上已经在给我们的时代命名,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给未来命运定向。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已然置身于风险的包围圈之中,“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风险社会作为现代性的直接后果,实质上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总体性表达,标示着现代性发展到了转折点,即现代性所产生的副效应或风险后果已对社会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而按现代性所预设的制度标准既无法被容纳也无法被消解,必然要随着社会生活的风险化而打破既定的现代性筹划去开辟通向现代性的新道路,即自反性现代性。在贝克的表述中,第二现代性等同于反思现代性。现代性的自反性运动是风险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

三、个体的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

针对个体化“不确定的自由”以及社会的风险性,贝克认为,个体其实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抽离与再嵌入过程。在吉登斯的眼里,抽离是指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7] (P.191)}。鲍曼则用社会的流动状态来指称这种抽离^{[8] (P.79)}。贝克则认为,抽离更多的时候是指个体如何从过去那些束缚他的社会群体中脱离出来并变成独立的个体来行动^{[9] (P.23)}。但是,确定无疑的是,个体越来越从外部的社会控制中抽离出来,这种外部控制不仅包括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也包括一些特定的群体类别,例如家庭、亲属、社区和社会阶级或阶层。

在马克思看来,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化过程等同于阶级的形成过程。与马克思相比,一方面,韦伯比马克思更加关注各种各样的现代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则忽略了市场社会中个体化的潜在趋势。因此,韦伯笔下个体化的过程被基于地位而形成的传统和亚文化的持续性与权威性所封锁。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个体化是与社会地位或阶级相关联的共同体形成规则。在马克思、韦伯看来,与18、19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个体主义相比,资产阶级个体化进程从根本上讲源自所有权与财产权的积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权威及统治结构的抗争中发展了它的社会与政治认同。

然而,第二现代性的情形恰恰相反,个体化进程正在从马克思和韦伯所描述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再次嵌入到新的制度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制度针对的不是群体,而是个体。个体化进程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这些产物表现在获得、提供及应用各种工作技能方面。尤其表现在教育、流动和竞争上。随着学校教育在时间上的延长,传统的目标导向、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都得到重塑,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教学方式及统一的知识。正是通过教育的导入,人们通过职业流动、居住地变动、雇佣关系变动及其初始社会位置的改变,使得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人们个体化背后的动力源。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流动来增强自己的竞争条件。从而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带来了快速的个体化进程。

在快速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个体化动力十足,人们看不清新的社会安排是多么新颖、持久,对

社会阶级洞穿的深度如何。相反,在第二现代性下,作为应对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方式,社会和技术变革为个体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巨大弹性以及新的工时规定。这些技术与社会革命带来了全新的个体化生活方式。这将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韦伯所预测的社会结构变体。而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雇员的个体化社会,阶级社会将会显得无关紧要。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特征基本上由传统和文化来界定,雇员必须受制于劳动法以及社会政治范畴的相关规定。如今社会处在一个独特的转型阶段,其间持续不断并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与去传统的、个体化的后阶级社会相一致。在雇员的个体化社会里也产生了以下特征:个体化进程将阶级的独特性与其社会认同剥离开来;不平等一点也没有消失,而由风险的个体化重新界定;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人们不得不结成政治和社会联盟;与获致性特征相关联的那些冲突持续存在,如种族、肤色、性别、族群、年龄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随处可见的这些不平等现象使得社会意义上的认同过程与个体意义上的认同过程相互分离开来。与此同时,个体的命运越来越为经济趋势和历史必然性所决定,像经济危机或繁荣、大学入学以及职场规则的严格限制等。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个体从传统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原有制度中抽离出来,重新嵌入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也就是说,第二现代性下的市场制度由于第一现代性的高度发达和不断完善才得以产生。同时,也正是在制度嵌入过程中,个体从第一现代性下的标准化人生变成了第二现代性下的“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性人生”。正如贝克夫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提出的,个体正在从“为他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

四、从“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

贝克1996年出版了《为自己生活》一书。在该书中,贝克认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快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连续性的、线性的,而是一种特殊的波浪式模式,包含了前进和后退。然而,运动的大致线索很好辨明,即从“为他人而活”迈向“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暗示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以一段话来确定其意义:“随着传

统社会的秩序的崩溃 隐约闪现出了像选择的自由之类的东西——对于女性而言 实际上仍然相当遥远……比如 在市场 中,女工就面临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孤独和生产安全等问题。但这也带来了某种机会: 妇女有机会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样的机会在传统社会秩序中想都不敢想。”^{[10] (P. 82)} 由于女性越来越摆脱了和家庭的直接联系, 女性的人生轨迹就经历了一次“个体化的激增” 并且与之联系, 经历了功能主义者所谓从先赋性角色向获得性角色的转变。个体化为女性开启了行动和做决定的新领域, 也为妇女带来了新的挑战, 因为现在妇女既得面对以前只有男性才需面对的风险, 也要面对由于个体化进程的“不完整”、处于尴尬的中间阶段而造成的进一步风险。今天, 妇女不仅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保护, 状况十分不稳定。所以, 较之于以前的生活模式, 妇女的生活前景既开放, 同时又缺乏保护。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贝克认为, “为自己而活”的前提是高度社会化, 最终还是要依靠制度。甚至只有在人们认清了它会遵循特定的制度目标时, 人们才能明白这一在历史上较晚出现的存在之“逻辑”, 才能明白其独特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培训系统、劳动力市场、福利国家和法律系统等, 都预设了个体行动者, 并解放了他。贝克所说的“为自己而活”, 既不是表达一种现在很盛行的个体主义或是自我主义, 也不是个体可以随意决定的一种生活, 而是一种彻底一致的生活。而这种一致性表现在, 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福利国家调控的环境下, 与越来越多的群体之间发生关联。然而, 正是这种一致性, 也导致了它的反面, 即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和反常的正常化, 后者取消了一切正常和非正常的标准。换言之, 是一个高度以功能为标准且高度分化的社会, 制造了“为自己生活”的开放空间。既不能再自上而下或自外而内地描述这些空间是如何被添空, 也不能提前预知。对个体过度的要求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则, 却又暧昧不清, 从而引发了相反的情况, 用经典术语来说就是解放和权利。因为日常生活的特性改变了, 既变得“去传统化”、个人化, 也变得明显具有全球化特征。甚至其他大洲发生的事情, 直接就进入了人们赖以构造自己生活的经验范围。从这一视角看, 孤立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趋势, 以及族群认同和地方性民族主义的复苏, 实际上是人们对过度个体化和全球化危险的反应。

五、展望未来: 重新回到涂尔干的命题

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 是带有浓厚社会—技术性的主体。也就是说, 生活中的个体, 终其一生都需要去解决各种系统矛盾。风险和矛盾依然会被社会地生产出来, 应对风险和矛盾的职责和必要性正在被个体化。也就是说, 贝克所谓的个体化是带有制度化色彩的, 他把个体化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个体, 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但这不同于帕森斯意义上的线性再生产系统, 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的、从“为他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虽然, 吉登斯与贝克都从制度主义立场来论述个体化, 但吉登斯侧重于从制度性风险进行阐释, 贝克则更强调技术性风险(尤其在早期著作中)对个体的影响。因而, 吉登斯的话语充满了社会政治理论叙述味道, 贝克的理论则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

总之, 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市场所主张的占有式、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①, 甚至也不同于启蒙个人主义^②。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核心, 并非选择的自由, 而是要认识到自我本身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完善的, 这是个体成为个体的观念过程。简而言之, 个体化正在变成第二现代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 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③。但是, 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问题, 即在命定的个体性和作为自决实践能力的个体性之间(后者对应着个

① 此种观点以自给自足的人的形象为基础。它假定, 独立的个体能够把握其生活的全部, 能够从自身内部驱动、更新其行动能力。

② 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张扬, 使得个人“自私自利”的追求大行其道, 从而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所有共同体的死敌”。然而, 尽管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开始就受到一些社会活动家、道德哲学家和宗教界人士的抨击, 但在近现代西欧和北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个人自主、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个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张扬追求, 在西方社会中已逐渐变成了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化信念”, 以致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中它已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信条, 并实际上使“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当代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

③ 第二现代性的个体化则认为存在着非线性系统。在这里, 不平衡与变迁是通过反馈环路内在作用于系统的。这些系统是开放的。反馈环路是非线性系统的鲜明属性, 反馈环路要穿过个体。因为, 个体化同时也是系统的不稳定。复杂系统不仅会再生产, 还会变迁。意外后果导致系统的不平衡, 而个体则是意外后果的来源渠道。

体化)——贝克用这个词来区分自我维持、自力推进的个体和仅仅被“个体化”的个体,后者指的是别无选择、只能如此、仿佛个性化并未实现那样去行动的——有一道正在逐渐拓宽的裂缝,这条裂缝我们如何来补救?换言之,个体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充满风险的社会,如何实现社会的整合?贝克告诉我们的答案是:(1)个体化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特征;(2)不仅不会危及社会的整合,反而是社会整合得以可能的条件。但是,在这充满风险和个体化的时代,我们如何保证个体的理性能力、个体负责的态度?

在100多年前,涂尔干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责任是设法成为一个完全彻底的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呢,还是仅为整体的一部分,有机体的一个器官呢?”^[2]在涂尔干看来,从一套社会安排过渡到另一套社会安排,期间必然出现动荡不安,也即“失范”。从传统共同体和旧制度到第一现代性,也即工业现代性形成自身规范,经典启蒙个人主义变成常态,中间有一个缺失根基的过渡期。这必然导致失范性的个人主义。贝克认为,从第一现代性(工业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信息现代性)的转变,同样也有这个问题。贝克认为,即使完成了第二现代性的转变,新的个人主义还没有日常化,即使到了它的成熟阶段,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涂尔干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建构道德下的个人主义。显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成为涂尔干笔下道德的个体,毕竟,如今社会已经变得不确定,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个体化与风险性并存的社会。个体变得自由而不明确,社会也在发生分裂,人类正处在建构的边缘。尽管如此,在这充满风险的全球化时代,每个人心中那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心依然能够慰藉每个孤独而漂泊的灵魂。因此,涂尔干的经典命题对于今天的个体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所以,在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一种人的文化心理性质和内在性秩序更为深层的变化”。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

序”的位移和重构。也许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不仅仅是个体从“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转换过程,而且更弥足珍贵的是让个体多一份道德、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关爱……正如贝克指出的:“随着社会规范的衰退,赤身裸体,惊恐万状而又富有攻击性的自我涌现出来,寻求关爱和帮助。自我在寻找自身和寻求充满友爱的社会性过程中,很容易迷失在自身的丛林里……一个在自身的迷雾中游荡的人已经注意不到,这种孤独,这种自我的孤立禁闭,是对大众的惩罚。”^{[10]〔序〕}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将在这些条件下行动,并承担我们为或不作为的种种后果。

[参考文献]

- [1]杨君. 社会学的传统、危机与未来[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
- [2]杨君. 涂尔干的现代性社会:主体建构与社会团结[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
- [3]杨君. 从孔德到吉登斯:社会秩序思想演化路径[J]. 理论月刊 2012 (12).
- [4]乔治·瑞泽尔.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System and Lifeworld, Trans. Thomas McCarthy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 [6]杨雪冬. 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 (4).
- [7]Giddens A.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M].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8]Beck U, Beck G E.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M].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9]Bauman Z.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 [10]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 个体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张立伟)